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四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一六期 ——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五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0712c)

【文革一页】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	潘祝平
【人物春秋】“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红人”——杨荣国	散 木
【专题研究】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下）	丁凯文
【书 评】记忆的备份——《文化大革命： 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评述	寒 山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文革一页】

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

• 潘祝平 •

“文化大革命”期间，说是北京出现了一个“5·16”组织，被认定为反革命阴谋集团。北京的“5·16”组织，究竟是怎么回事？该不该在全国搞清查？笔者不明真情，不便评论。

就江苏来说，并不存在“5·16”组织。然而自1970年4月起，江苏却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5·16”运动，1971年形成高潮，历时三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

◇ 十三万人被打成“5·16”

当时江苏主要领导人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场全歼“5·16”的人民战争。

很快在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权力很大的第二专案办公室（南京称“320”办公室），简称“二办”，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5·16”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5·16”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连负责看押警戒。各级“二办”皆由党的一、二名主要领导人，避开党委集体单线领导。受兼任江苏省党政“一把手”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员吴大胜独管。这起冤假错案，“二办”虽非罪魁祸首，但充当了冷酷无情的打手。

江苏清查“5·16”涉及范围很广，造成打击面严重失控。“文革”中的群众组织，被视为“5·16”极易进入的黑窝，其成员大都成了清查对象。这些群众组织在“文革”中都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有些还犯有打砸抢和参与派性武斗的严重错误，但其成员的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却当成敌我矛盾从中打出了成批“5·16”。少数坏头头有罪行应依法惩处，但与“5·16”并非一回事。此外，原地方党政机关及其它机构，在“文革”中被称为“旧机关”，其工作人员被视为“旧人员”。认为这些“旧人员”中有不少人对“文革”、军队“支左”、军管等，有抵触不满甚至反对情绪，易与“5·16”气味相投，也成了清查对象。这些“旧人员”中的原各级地方领导干部，成了清查重点，尤其是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特务”、“假党员”的领导干部，往往被当作“5·16”的黑后台、黑顾问深挖。有不少领导干部已经“三结合”进入各级革委会也不能幸免。省“二办”为了深挖全歼“5·16”，还列出31个问题，不管有未填表参加“5·16”组织，只要沾上其中一条，都要戴上“5·16”帽子。

1970年4月清查开始后，省“二办”就曾扬言，江苏不挖出十几万“5·16”说不过去。1975年彭冲主持省委工作后，当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透露，江苏在三年多清查中，果然有13万多人被打成“5·16”分子，其中南京市就有2万多。据当时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各地市县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5·16”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仅以溧水县和滨海县为例便可说明。溧水县死亡36人，被严刑拷打重伤100多人；滨海县死亡18人，伤残60多人。

◇ 南京大学成为清查“5·16”的突破口

南大被认为是“5·16”敌情最严重的单位。1970年4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大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直管，派省党的核心小组（当时省委尚未恢复）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南大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5·16”分子108人，点名“5·16”248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60人卷入了“5·16”漩涡。其中有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

南大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打出成批“5·16”？虽然也搞“政策攻心”，但主要靠所谓“军事压力”，大搞逼供信。连续战斗几昼夜（最多13个昼夜）攻下“顽固堡垒”，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宽严大会上戴手铐，小分队滥用十几种体罚等等，主要靠这些手段逼出“5·16”，也逼出了人命。一位吃尽苦头的受害者事后谈及当时的处境是，“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泪”。南大大搞逼供信经验，在全省流毒很广。

南大作为突破口，不仅在教职员学生中打出了成批“5·16”，而且揭出了地方领导干部和军队领导干部的“5·16”问题。这两点突破非同寻常。

在南大蹲点的迟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5·16”的一

位中层干部对其泄愤检举后，迟明堂也被打成了“5·16”。1971年2月靠边审查，1971年10月隔离审查，不久被武装押解投进监狱。这一突破为日后成批地方领导干部打成“5·16”开了先例。省“二办”奉命抓紧对全省地市局级以上地方领导干部进行排队摸底，排出了一批涉嫌“5·16”问题的对象。在省级领导干部中占72%，厅局级领导干部中占38%，十五个地市领导干部中占41%，地市一把手中占69%。以此为依据加紧了对各级地方领导干部的迫害。

在江苏“支左”的军级要员吴大胜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5·16”骨干泄愤检举。虽未能触动吴大胜，但另两位“支左”要员，一位被无端怀疑，一位被蒙冤审查。此后省“二办”奉命大整军内涉嫌“5·16”问题的干部材料。据1975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在查获的省“二办”秘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298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84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11名。此举大大超越了江苏的范围，也大大超越了吴大胜的职权范围，经何权威授命？想必大有来头。

◇ 省五七干校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

江苏清查“5·16”，在南大突破后，省级机关首当其冲。当时省级机关连同省五·七干校共5000人左右。清查“5·16”在两部分人员进行。一部分是省革委会机关及所属各部门各单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留守人员”，另一部分是进入省五·七干校的“脱产人员”。1971年干校的人数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60%以上，因此干校承担了省级机关清查“5·16”的重任。

在省级机关“留守人员”中清查“5·16”的高潮在1971年。经过“春季攻势”，到1971年6月，被打成“5·16”的占33.4%。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占55.5%，处级干部占42%，一般干部占30%。为了扩大战果，不久又发动“秋季攻势”，到1971年11月，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多达2400余人，连同已经打成“5·16”的，竟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70%以上。

省革委会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45人中有25人打成“5·16”，其中有8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二办”认为省农业局的班子是“5·16”搭起来的，把所有“留守人员”关在机关内43天搞深挖。有一位同志爱人难产、岳父生病，不但拒绝其请假，还要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外面来人联系工作，除派人监视一楼值班室，还在三楼放了望哨监视传达室。宜兴一位同志来联系毛竹问题，疑为“5·16”同伙关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干部来找局领导，也疑为“5·16”同伙关了两天，勒令交待问题，最后要当地派人领了回去。消息传开后，好几个月谁也不敢来省农业局。

省农业局64名“留守人员”，有39人打成“5·16”。打成“5·16”的局领导占60%，处室负责人占62%，党支部委员占80%，党员占64%，党支部几乎成了“5·16”支部。

省科技局被视为“5·16”的黑据点，“二办”认为科研单位是“5·16”的重点。1000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打成“5·16”关押100多人，逼死5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有的科研单位100%的科以上干部和80%的一般人员都打成了“5·16”。

省科技局在清查“5·16”最紧张时，直属科研单位的工作几乎全部停顿。1972年的一个重大科研项目大面积集成电路新工艺，组织了研究所、高校和工厂的科技人员三结合试制队伍，经过一年多努力，就在科技成果快拿到手的关键时刻，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参加科研的师生，奉命回校参加深挖“5·16”，科研课题中途而废，使200多人辛勤劳动，投资500多万元试制出来的设备束之高阁。

省五七干校，1971年有3000多人，除原在干校搞“斗批改”未分配的1000多人外，其余是在清查“5·16”开始后陆续进来的。1971年4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100多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为“5·16”后首批送进干校审查，到1971年底已增加至200多。首批进干校的省革委会常委、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10多位老同志，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的，回家取衣物也不允许。其他涉嫌“5·16”问题的干部，也一批批被点名送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已经下放在南京钢铁厂的60多名干部也被装上卡车押进干校，下放在外地的也一批批揪回干校。到1971年底，干校3000多人中，点名为“5·16”审查的有1600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400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审查的占80%以上。干校已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

在干校各处墙头和宣传栏上，仇视“5·16”、批臭“5·16”、深挖“5·16”、全歼“5·16”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到处呈现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在干校被审查的对象一律与他人隔离。按南大“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的经验，不分昼夜的车轮战成了惯用手段，罚站10多小时（最长19小时）更是常见。不少受害者实在吃不消，被迫承认参加了“5·16”，却又遭来更大祸端，继续穷追猛打逼交“联络图”同伙，使清查形成了滚雪球。一时间干校出现了一种景象，干校内的“5·16”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干校外的“5·16”审查对象一批批送进来，清查的雪球越滚越大，“5·16”越滚越多。

为了做到“一个不漏、一网打尽”，干校还发动“以毒攻毒”，要被审查者检举揭发专案人员和小分队成员中的“5·16”。这就给被审查者泄愤检举的机会。以干校一大队为例，一名小分队长今天斗人，第二天进了密封室；一名大队核心小组成员，今天要“5·16”缴械投降，第二天办了他的学习班，要他缴械投降；大队的一名主要负责人也挂上了“大名单”，成了“5·16”嫌疑分子。“以毒攻毒”的结果，在干校引起了一场混战。

1971年下半年，干校多次召开宽严大会。9月份的一次宽严大会要宣布对几名“5·16”顽固分子从严处理。为大造声势，动员干校周边农村的部分干部群众参加。一些农民见会场周围有荷枪武装警戒，误以为干校要杀人。干校虽未杀人，但超越司法机关的职权，给从严处理者戴上手铐宣布法办。

◇ 清查“5·16”成为南京市头等大事

南京市被认定为“5·16”大本营，将清查“5·16”作为头等大事，与“一打三反”结合，全力以赴。三年多时间内，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从上到下先后组织了2万多人的清查“5·16”专案和小分队队伍，举办了各类揭批斗学习班3900多个、2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多达20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1200多场，收到举报材料2万多件。在1971年6月至10月，4个多月内就有5000多人打成“5·16”，其中骨干600多人。到1972年底，2万多人打成“5·16”，逼死300多人，仅市商业系统就有33人自杀身亡。

原市委市人委领导成员，除岳维藩、郑康二人外，都视为“5·16”黑后台，遭到批斗审查。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押批斗开除党籍，清查“5·16”时又挂上钩。此时刘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却要刘中“先查思想后查病”，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原副市长房震戴上“5·16”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图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级领导成员中一位女同志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认了“5·16”黑后台，仍不放过，直至逼交出300多名“5·16”组织网络后才罢休。

市级机关清查“5·16”，以最先清查的市公检法机关为例，便可知其激烈程度。一位在此主管清查工作的军队“支左”人员，事先即预言，市公检法机关的“5·16”有一个加强营。强攻的结果，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全部打成“5·16”。处级干部除一名副处长外，无一幸免。600多干警，159人打成“5·16”，逼死4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市公检法机关几乎全军覆没。

其它市级机关清查“5·16”也相当激烈。市革委会机关450余人，至1971年底已有107人打成“5·16”，加上挂上“大名单”的200余人，也占70%左右。

南京市各系统的基层单位，清查“5·16”也搞得“轰轰烈烈”。如华东电子管厂在一个动员会上，就有几百人上台坦白交待“5·16”问题，并检举揭发别人，有的竟能一下子开出几十个“5·16”干部名单。结果全厂近半数的干部和职工都成了“5·16”。又如江南光学仪器厂，要求所有干部职工都要坦白交待和检举揭发“5·16”问题，人人都要过“5·16”关，搞得人人自危。很多干部职工稀里糊涂地成了“5·16”。

江苏其它地市清查“5·16”也不甘落后。以盐城地区为例。原地委常委13人，打成“5·16”的6人，挂上“大名单”的4人；中层干部84人，打成“5·16”的43人，占51%。地区公检法机关500余干警，打成“5·16”的327人，占65%。

江苏清查“5·16”的冤假错案，是十年浩劫的一部分，不应被遗忘。因史料不全，本文虽未能作全面回顾，但也可使读者从片断情况中得知江苏这场浩劫的部分真相。

□ 《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

## 【人物春秋】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红人”——杨荣国

· 散 木 ·

中共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意图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而“四人帮”却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在这场运动中，有几位学者曾红极一时，杨荣国是其中之一。斯人已逝，其功、其过皆已化作尘埃。不过，其前车之鉴，这倒是我们后人须多加体会的了。

◇ “一跤跌进大红大紫的荣誉里”

杨荣国（1907—1978），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学者，湖南长沙人。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他长期在中山大学工作，一直到他逝世为止，先后担任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校党委常委等职。这期间，他的命运可谓跌宕起伏。

“文化大革命”之前，杨荣国已在共和国历次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有所表现，小有名气。如批判胡适、梁漱溟以及在“拔白旗”运动中批判中山大学的刘节等，他先后写有《胡适的反动观点和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歪曲》、《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如何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批判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讲话》等文章。大概也是因为如此，根据于光远的回忆：1961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第四次会议。当时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很重视，提出愿在会议期间找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座谈会名单是中宣部开的，报上去后毛泽东同意了。在这个名单里，年长者有高亨、杨荣国，至于青年人，则有王若水、姚文元。据说毛泽东和姚文元就是在这个座谈会上第一次见面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杨荣国与众多“牛鬼蛇神”的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严酷的批斗，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被隔离审查，还遭到过非人的迫害，抄家、毒打、扣发工资、被派送到“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其妻子陈慧敏更因受到株连，被折磨成精神病患者，后弃家出走，又溺水身亡。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随后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中，杨荣国的命运却突然转向了。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审查之后，1973年，杨荣国恢复了工作，此后他还曾任广东省理论工作小组副组长、中山大学哲学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山大学党委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等。

杨荣国命运何以如此剧变？这要从他发表在《红旗》1972年第12期上的文章《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说起。这篇文章是杨荣国应《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汪子嵩之约写的，据说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孔”的第一篇文章。杨荣国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孔子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他提出的主张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此后，1973年8月7日，杨荣国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对他的上述观点进一步详细阐述。文章说：“春秋时代，奴隶制国家先后灭亡的有52国，奴隶制度日趋崩溃，这时候，孔子提出来的政治口号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就是要复兴被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权力，让那些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出来当政。这是彻头彻尾的复旧反动的政治口号。”文章还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个‘仁’字。这个‘仁’，原来就是殷周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文章最后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分析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看在当时历史发展的条件下，他是站在进步阶级方面，主张革新呢，还是站在反动阶级方面，主张保守。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肯定的，只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东西，对反动的、保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否定它，批判它。所以，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对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会有帮助的。”

毛泽东显然注意到了杨荣国的文章，并向他人推荐。1974年1月27日，江青在新华社总社学习班讲话，谈到“批林批孔”运动发动经过时，提及这件事。她说：“我大概是去年春天去看望主席”的。“去年春天”，正是1973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批林批孔”话题的时候。江青回忆当时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为了“批判”而看的，又特意印发了此书。此后8月5日，“主席把我叫了去，叫我作笔记，写了一首诗，标题叫《〈读封建论〉呈郭老》”，当然，这是“批判”郭沫若的。接着，江青说：“主席那天还给我讲了，杨荣国教授说孔子是为奴隶主服务的，这样我才看了杨荣国的文章。”她又说：“主席给我讲：北京才怪呢，北京就不欣赏上海、广州的学者。现在北京不同了，北大、清华的教授、助教和青

年三结合的班子搞出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立了大功。”“上海、广州的学者”，包括杨荣国，跑在了“批孔”的前列，及后而跟上的，则是北京的“梁效”。

由此，杨荣国命运骤变，并很快成为红极一时的“批林批孔”学者。

1973年9月8日至11日，当时国务院科教组召开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杨荣国在会上作了《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的报告。

杨荣国讲完后，科教组负责人迟群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迟群还恶狠狠地说：“哪些地方不重视‘批孔’，哪些地方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

继之的17日，杨荣国又在《南方日报》发表了《林彪贩卖孔孟哲学“天才论”的反动实质》一文，随即又于翌年先后发表有《桑弘羊的哲学思想》（《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林彪、孔丘都是开倒车的反动派》（《南方日报》3月5日）、《先秦儒法两家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光明日报》8月24日）等文章。

也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出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按照形势的要求，对其《简明中国哲学史》一书作了相应的修订，在书中加入了关于儒法斗争的内容，197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1973年“评法批儒”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杨荣国的文章红极一时，成为各地组织学习的典范之作。杨荣国最“红”的时候，是“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讲过评法批儒，接着到各省讲学，都是各省省委和省革委领导人到飞机场、火车站迎送，在省报头条上发消息，特号字大标题报道‘杨荣国教授来我省讲学’”。到了1973年12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一书。

不过，由于是奉命而作，加上多年意识形态斗争的套路和惯性，杨荣国的这些著作、文章只堪是“帮派文章”，很难说有学术价值。例如，他在《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中说“南子长得漂亮，孔子对她有野心，特地去会见她，由此可见孔子的所谓品性，所谓道德，看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并不那么正派”，这几乎是对孔子进行人身攻击了。更加不幸的是，如果说杨荣国此前的“批林批孔”还算得上是一家之言，这时却已完全成为“四人帮”攻击周恩来等的炮弹了。此后，江青等借反对“走后门”发难，杨荣国被“四人帮”牵着鼻子走，进行所谓“周游列国”式的巡回报告。报告中竟不顾历史学家的本分，妄将“子见南子”解释为孔子“想到卫国去做官，走内线”，以及“孔子走后门，想通过南子在卫君面前讲些好话，使自己能在卫国上台，做大官”等等。

#### ◇ “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杨荣国必不可免地再次受到了“批判”，只不过这一次是不点名的“批判”了，当时许多报纸上的文章在提到他时，都用了“广东那个教授”的说法。

1978年8月，杨荣国由于受到审查和批判，心情抑郁，在广州患癌症过世。

在病中，因为他当时的名声，导致他在医疗中也受到了一定的歧视，他从广东的迎宾馆总统楼，相继迁至部长级房间、高干病房、普通病房，曾经的那些络绎不绝的探望者，忽然一夜

之间不见了。所谓世态炎凉，杨荣国是亲身体会到了。

关于此事，舒芜在《忆杨荣国教授》一文曾详细讲述，他说：“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之中，评法批儒运动当然要作为一场政治阴谋受到清算，杨荣国也免不了受到批评，但报刊上并未点他的名，只称为‘南方某教授’，留有余地。不久就听说杨荣国病逝广州。后来又听说，已经查明，他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并无关系。还看到他女儿发表的文章，写他父亲病重住院时，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她父亲立刻从首长住的特级病房被迁入高干病房，又被迁入多人合住的普通大病房，饱尝顷刻炎凉的滋味。还说当时批判揭发中有一些过火不实之词，例如有此一说：美国总统特赠周恩来总理一种名贵特效良药，被移用于杨荣国身上，致使周总理不治，此说最使群情激愤，杨荣国最感冤屈，几次言之泪下。我看了也不禁浩叹。我确知杨荣国几十年前就鼓吹法家，此在‘文革’初期，并未使杨荣国能免于‘牛棚’受难，家破人亡；到了‘文革’后期，不知怎样被‘四人帮’发现了，适合了政治阴谋的需要，遂使杨荣国一跤跌进大红大紫的荣誉里。大概他自己还真以为吾道大昌，天将以为木铎，却不知只是被摆到场面上利用利用而已，密室阴谋是不会让他这样一个老书生与闻的。他的悲剧是注定的。”

1982年6月，在杨荣国病逝4年之后，中共广东省委纪委对其作出结论：“杨荣国同志在‘批林批孔’期间，为迎合‘四人帮’所谓‘儒法斗争’的需要，不惜歪曲事实，散布了不少错误观点。但未发现杨荣国同志与‘四人帮’有组织上的联系。考虑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同意不给处分。”

说杨荣国“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以及杨荣国“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并无关系”，这也是说杨荣国并不是“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的确，所谓“评法批儒”，杨荣国和发动者的心思就是不同的，正如舒芜所说：“我也知道杨荣国讲法家，不自今日始，解放前他在南宁写中国思想史时，已经对法家评价很高，正好适合了目前某种需要，倒不是有意迎合，曲学阿世。”

说杨荣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表现，并非都是“唯上”，是因为杨荣国在学术上从来都是一个“抑孔”的学者。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桂林和重庆，杨荣国先后写有《中国古代唯物论研究》和《孔墨的思想》等著作，书中他持“扬墨抑孔”的主张，这也是他一贯的主张，可谓终生不渝。当时后方的进步学者，代表者如郭沫若是“扬孔抑墨”的，翦伯赞、杜国庠、侯外庐和杨荣国等则相反。当时《读书与出版》杂志曾介绍杨荣国著《孔墨的思想》，称：“对孔家与墨家学说的估价，在抗战时期学术界中曾引起过一番争论。郭沫若先生对于这问题的意见在《十批判书》的《孔墨的批判》一篇中说得非常清楚。郭先生认为，在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变革过程中，‘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的解放的，而墨子则和他相反。但别的学者，如翦伯赞先生和《孔墨的思想》一书的作者杨荣国先生的看法则恰恰与郭先生的相反。杨荣国先生在这本书中认为，孔子生在‘奴隶制正趋没落，封建制则正在那里开始发芽’的时代，而孔子的立场则是：‘出身于旧的贵族，他非常不甘心旧的社会就这样没落下去，总在想设法把这一旧社会维护住。’至于墨子呢，他‘和孔老夫子成了敌对派，孔老先生是在如何维护贵族，墨子则反是，他就甘和下层社会为伍，来反对贵族’。当然不能把郭先生的意见和复古派的歌颂孔孟并为一谈，郭先生是企图从封建专制时代的儒家的烟瘴下恢复孔子思想在当时时代中的真实的地位。当然也不能以为翦、杨诸先生的意见就是把墨家的思想看做是完整的革命思想，他们也是企图把墨家在当时时代中的本色揭露出来。这一个争论在学术界中可说并没有十分展开，所以这也未得到一致公议的结论。现实的许多迫切需要人们去解决的问题使得学术界不可能多花精力在这类问题上。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小问题，这里不仅是有关在三千年来的历史上极有影响的两大学派的估价问题，而且是从这一问题上接触到如何总结中国的思想史，如何估价历史上的种种思想学派的根本问题。”



杨荣国当时的几部著作，如《孔墨的思想》、《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都反映了他执着地打倒“孔家店”的立场。“孔丘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反映了奴隶主贵族的意愿”，这是他根据研究得来的体会，遥自“五四”之后，有许多人赞同这种意见。

至于后来的杨荣国，其弟子之一的李锦全曾在《杨荣国文集·前言》中评论说：“杨荣国在学术上取得一些成就，主要是在这个年代通过艰苦奋斗得来的。他曾经说过，自己不是出身于名牌大学哲学系，亦没有受过名师指点，学的是教育，做过几年中学教师，参加革命后做的是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对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是他自学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通过学术争鸣形成自己的观点。如对孔子思想的评价和郭沫若不同，他认为孔子说的‘复礼’和‘吾从周’，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是主张历史的倒退。‘文革’时期‘四人帮’胡说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这是别有用心来影射攻击周总理。而杨荣国所以批评孔子说的‘吾从周’，并非反对周公本人，更与影射周总理无关。他认为春秋时代的孔子，却主张‘复礼’、‘从周’，即恢复到西周社会，那是开历史的倒车，所以提出批评。由于他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古史分期的看法，认为殷周是种族奴隶制社会，到春秋战国才转向封建制。他在‘文革’时写的批孔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这不过是他在《孔墨的思想》一书中原有学术观点的发挥。但由于‘四人帮’的利用和歪曲附会，把批孔说成是批判‘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线’，后来又可以说可以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这完全是政治上的附会，并非是杨荣国本来批孔的原意。”这就把问题说清楚了。

□ 《历史学家茶座》2007年第2期。标题和内容略有改动。

~~~~~

【专题研究】

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下）

• 丁凯文 •

五．文革之中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

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期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文革史研究者们研究文革历史无法回避的课题。由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将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定位为“他（指周恩来——笔者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日后国内研究周恩来的文章和书籍大都遵循此说，笼统抽象地将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解释为对立和斗争，但他们却举不出一件具体事例来说明周恩来是如何与林彪“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的。（74）如果我们将这句话改写为，“周恩来在文革中与林彪关系融洽密切、互相尊重与支持，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见解相同”则更加贴近符合历史事实。

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目的在于着手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亲手将林彪的名字从常委排列的第六名提升到第二名，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党内第二号人物，而周恩来依然是第三号人物不变，林彪这位曾长期居于周恩来下属的人一下子成为周的顶头上司，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项决定坚决拥护支持。一来，周恩来一向以毛泽东的意志为意志，二来，周恩来总是将自己摆在辅佐、帮手的位置，对接班人一职不做非分之想。这就注定了周恩来对林彪的基本态度。毛泽东就曾说：“不管是我、少奇、林彪、小平，都离不开总理。总理不能当第一把手，可是谁当第一把手都离不开他。”（75）从历史渊源上来看，周恩来长期位居中央领导地位，而林彪则在外领兵打仗，林彪很少参与以往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鲜有参与历次党内整人活动，这在党内高级领导人当中是很少有的。所以，林与周恩来没有个人芥蒂。自1959年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林彪对周恩来的国务院工作都给

予大力支持，周林关系一直密切。

林彪在文革初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后，周恩来对林彪的态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1）周恩来对林彪的大力称颂。1966年10月28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林彪同志，林彪同志最通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最近提出了要把学习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他提出了许多精辟语句，如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76）1967年1月21日，周在人大大会堂接见军队参加四清工作队员同志时的讲话说：“我在十一中全会上说过，林彪同志确实确实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经过了几十年的考察，是心悦诚服的接班人，是我们的副帅，因为他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是把我们解放军培养最好的一位领导同志。另一个是陈伯达同志，把毛泽东思想阐明的最好，他是杰出的理论家，用理论的文章来宣传，我向全党推荐这两位同志”（77）1969年4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九大全体会议上再次全面长篇称颂林彪“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终紧跟毛主席，不愧是广大革命群众公认的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从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申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它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有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78）周恩来原本长期是林彪的顶头上司，现在却变成了林的下属，但周恩来为树立林彪的接班人形象而甘为人下的表态无疑成为全党的表率。

（2）周恩来对林彪极为尊重。周恩来在文革时期的讲话每当提到毛泽东时，必定还要加上林彪，将毛林二人并列提及。比如1966年9月26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说“我现在首先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林彪同志、林彪副主席、代表国务院以及我个人向你们问好。”11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学生时，开头就说“我首先代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问好！”（79）周恩来在文革时期这样的讲话不胜枚举。

此外，周恩来的讲话中还大量引用林彪的讲话，以突出林彪的地位。在行动上，周恩来也自觉地将毛林二人放在首位，文革时毛林出现在公众场合时，必然是毛第一，林第二，周第三。周恩来除了事事向毛请示汇报外，同样也向林请示汇报。有时甚至当毛有意只向周交代的事，周也向林通气。1967年8月毛泽东要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回京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个人的意旨，以打倒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关戚”，并对杨说此事只向周一人汇报。但周对杨说“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对主席讲，说是我让您向林副主席通报的。”杨随后飞赴北戴河向林通报此事。（80）庐山会议后，毛对林已心生反感，毛在1970年11月让李志绥医生开展慢性支气管炎的研治工作，李医生说要与周恩来讲，以便得到国务院的大力支持，毛同意但强调不要告诉林彪。但是周实际上还是向林作了汇报。李志绥对此心存忐忑很长时间，但周对李医生说“这是我报告林副主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和领导，林副主席是我的领导，我怎么能不报告他呢？”（81）即使是在毛林明显交恶之后，周恩来仍然严守分际，在1971年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城楼晚会上，周恩来为了摄影师是否拍到了毛林在一起的照片而焦虑不安。王力以自己的亲身观察说：“总理对林彪还是很尊重的。”（82）事实上周恩来对林彪的表现是一贯的，不能用“周脚踩两只船”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来予以解释，这些都表明了周恩来的党性原则和对林彪的尊重。

（3）周恩来对林彪的保护。文革初期，林彪长女林晓霖在所在学校哈尔滨军工学院积极

参加造反派，林彪对此很不满，曾发有一信给哈军工声称林晓霖只代表她自己，后又将其转送他处隔离保护起来。1966年11月18日周恩来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谈话时，周恩来为林彪作辩护说：“林副主席讲话我看过了，我证实是真的”。“这个问题你们不要去研究了，最伟大的人对自己子女也处理不好，封建社会里有句话：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了。他们把它（林副主席指示）到处张贴是不对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娃娃们不懂这些事情。这是林副主席和造反团随便的谈话，家务事也讲了”。（83）九届二中全会上周为林彪修改讲话稿，并致信康生称：“为使林副主席讲话不发生任何副作用，请你起来后认真读两遍，又需要改动处，请用铅笔改上于午前退我亲收。此事纯属爱护副帅，忠党、忠于领袖，以此共勉，暂勿告人为慰。”（84）周恩来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保护林彪，不希望党内矛盾激化，周恩来用心良苦。

（4）周恩来对林彪领导下的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大力支持，其中涉及到军队的战备工作、国防建设、对外军援等诸多方面，这样的事例有很多。中共九大后，经毛泽东、林彪批准，国防工业各口划归军队管理，生产和基建项目由军委办事组计划平衡，再由整个国家计划平衡。1968年9月周恩来就强调一定要把国防工业赶上去，我们已经耽误了两年，再不允许耽误了。1969年2月，周恩来召集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等部委军管会及部门负责人会议，谈及国防工业的生产问题，强调抓紧常规武器的生产，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互相配合。3月份针对苏联可能对珍宝岛的进攻，周恩来与军队领导商量加强中方岸基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的作战部署。1969年9月周恩来还亲自指导了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11月下旬周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防工业问题，并接见国防工业系统几个专业会议的代表，并指出：要把革命和备战结合起来，努力抓革命、促生产，用备战影响革命，以革命支持备战。（85）中国的经济建设在那个时期开始逐步步入正轨，取得了傲人的成就，如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核潜艇研制成功等等。正是由于周恩来对军委办事组工作的大力支持，军队投入“三支两军”的工作顺利展开，不仅起到了稳定全国局势的作用，且迅速恢复了由于文革运动造成停滞的生产，使国民经济得以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得到较快的发展。

林彪在文革中与周恩来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林彪与周恩来有长达四十年的深厚友情，彼此尊重和信任。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争，从井冈山的斗争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林彪一直是周恩来的学生和战友，他们都经历了枪林弹雨的考验，一同走过了那如火如荼的岁月，用“生死之交”来形容周林二人的关系并不为过。文革期间周林的关系更显密切。在中共九大的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称颂林彪，林彪听后极为感动和不安，当场即席发言说“听了总理刚才的讲话，事先我不知道他讲话的内容，……我仅仅只有这么一点觉悟，并不是像总理说的那么高瞻远瞩，全面地看问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说老实话，我几十年来确实拥护毛主席的，我整个思想水平可以说很低很低的，不象总理说的那么高，后来在工作中略为有些成绩，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86）面对周恩来的赞颂，林彪可说是诚惶诚恐的，林彪的临时讲话显示出林的真实的心态和对周恩来的敬重。

（2）林彪领导下的军队系统坚决支持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和九大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无论是叶剑英、杨成武主军之时，还是后来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军委办事组当权之际，军队系统不仅从未参与过中央文革倒周的活动，而且大力支持周恩来在中央的工作，这与林彪对周恩来的态度有必然地联系。林彪曾对周表示：你要大胆主持这个会，放手处理问题，我现在情况不熟，身体不好，全靠你了。林彪还向军队方面的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全力支持周的工作。

（87）以江青为首的“上海帮”故意为难周恩来时，林彪都会通过军委办事组及时施以援手。1970年5月17日，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等

人开会，诬称周恩来“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江青还说黄永胜等人在搞军党论。（88）面对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黄永胜等人当场与江青顶了起来，随即宣布退场。事后黄永胜、吴法宪在林彪的指示下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的言论，邱会作则去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通报有关情况。周含着泪握着邱的手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就是老同志！”（89）林彪十分了解周恩来的困难处境，所以林经常告诫军委办事组几位将军尊重周恩来，因为无论是毛还是林，无人可以像周恩来那样处理好全国的事务，林甚至警告吴法宪不要听江青和康生那些攻击周恩来的话，林相信康生有意取周而代之。（90）林彪在文革中对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与维护恰恰是当今国内史学研究者有意忽略的。

（3）林彪与周恩来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较为一致。在解放干部问题上，周林的看法基本一致。1971年万里和赵紫阳就是在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大力支持下得到解放，万里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赵紫阳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军队干部如杨勇、张宗逊、梁必业、张震等人也都榜上有名要被相继解放。（91）在九大前后，周林对中国政治走向的看法也较为一致，也就是文革已告一段落，应该开始抓紧国民经济的建设。正是由于陈伯达受林彪的委托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彪的这一想法自然就体现在陈伯达的笔下。陈伯达起草的报告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以陈伯达在中共中央里的地位，不过就是中央的笔杆子，号称“老夫子”，如果没有林彪的首肯和支持，陈伯达不可能自己凭空想出这么一个报告题目。林彪的这一想法实际上与周恩来也是不谋而合的。

正由于周恩来与林彪相互尊重与支持，且政治理念一致，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处于最佳时期。特别是中共九大之后，全国的混乱局面逐渐趋于平稳，国计民生也开始步入正轨。但毛泽东对此却产生了不满，随后“上海帮”与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从而导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批判张春桥，而后遭到毛泽东的全面反击，最终引发了震惊中外的“913事件”。在庐山会议过程中，由于毛泽东不满林彪将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想要将吴法宪与陈伯达一起批判，而周恩来则向毛进言，请毛泽东去掉《我的一点意见》之中对吴法宪的批判。毛泽东在庐山上权衡轻重后毅然将陈伯达拿来祭刀，拿掉这个越来越不听使唤的文人，作为打开批林的一个突破口。这之后周恩来一直暗中帮助吴法宪和军委办事组其他人检讨过关，并设法缓和毛林之间的矛盾。周恩来为了保护林彪，不仅在庐山上恳请康生连夜修改林彪的讲话稿，还给吴法宪出主意，让吴主动写检讨过关。（92）周恩来很清楚，保护了吴法宪实际上也就是保护了吴背后的林彪。周恩来与林彪的这层关系实际上一直持续倒“913事件”的前夜。当周恩来最终得到林彪确实死于蒙古温都尔汗的飞机坠毁消息后，周曾为此失声痛哭。这里包含了周内心深处对林彪的悲痛和惋惜，显示出周恩来对林彪的真实情感。

事实证明，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期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互相尊重与支持，且持有基本一致的治国理念。现在中共将周恩来与林彪关系解释为周恩来与林彪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一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是无视事实和有意误导视听，无非就是想人为地区分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一方面拔高周恩来的伟人形象，另一方面则继续抹黑林彪，让林彪充当毛泽东文革罪孽的替罪羊。

六．如何评价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的作用？

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依靠三个人，江青指挥造反派在前台的冲锋陷阵，周恩来不仅负责执行毛泽东的各项战略部署，且负责保障文革得以顺利进行的经济基础，一身兼了毛泽东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的角色，而林彪指挥军队为毛泽东的文革运动保驾护航。周恩来和林彪都是毛泽东文革当中必须利用的力量。但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则看出林彪的作用还主要局限在军队内部，可周恩来的作用不仅涉及到全中国的各行各业，周对军队同样有极大的影响，军委高层的几位老师老将军们，如叶剑英、杨成武、黄永胜等人

都听周恩来的，与周合作密切。整体而言，毛泽东是文革一切政治决策的决定者，而周恩来则是其执行者。文革当中没有毛泽东的决定什么事都不能办，而毛泽东的决策又离不开周恩来的具体执行。正是由于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运动中坚定的拥护者和具体执行者，再加上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的大力支持，周恩来成为中共高层一个无可轻易代替的力量，周在文革前期虽偶遇危难但却总能化险为夷，这与毛泽东的使用与林彪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与林彪同属中共的老干部，他们都具有其他老干部相同的特点，也有与他们相同的弱点。那就是对毛泽东君臣般的关系。周恩来与林彪都不可能违逆毛泽东的意图，更不可能改变文革的大方向，他们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小小的调整，所以周林二人本质上殊无二致。文革期间他们都秉持了“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忠君式思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这句话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都说说过多次。周恩来“保持晚节”的心态更加严重，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步上了刘少奇的后尘，一个“伍豪启示”一直压在周的心上，成为周的一块心病，以致1975年9月周临进手术室做手术之前还要再次对其订正处理，免得有朝一日成为自己倒台的一大罪状。在林彪倒台前，周恩来与林彪互为依靠，小心谨慎地与毛泽东一手扶持的江青为首的“上海帮”周旋，试图“抓革命促生产”维持全国的稳定，为毛泽东收拾文革以来造成的烂摊子。可是林彪由于对“上海帮”的打击出手过早成为毛泽东清洗的对象，从此周林之间的密切关系解体，周一人孤立无援，成为日后“四人帮”集中攻击的目标。

周恩来在文革中与林彪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1）周恩来比林彪更早一些介入了毛泽东的文革运动，且周恩来在文革时期一系列重大事件上发挥了比林彪更重要的作用。

（2）周恩来介入文革的时间比林彪更长，林彪只趟了5年文革浑水，可周却趟了几近10年。

（3）林彪文革中的作用基本上局限在军队内部，“三支两军”后军队开始介入地方的文化革命运动，但林彪涉及并不多，而周恩来在文革的作用则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

（4）周恩来在文革中从未提出过任何大政方针，也不敢公开抵制江青为首的“上海帮”，而林彪则敢于反“上海帮”，坚决有效地抵制了江青试图插手军权的企图。

关于周恩来在文革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国内不少学者多有论述。笔者只想强调，周恩来最亮眼的表现是，在文革乱局中仍不忘国计民生，在紧跟毛泽东搞文革“抓革命”的同时，还尽力设法维护全国的生产，不使经济全面倒退。特别是周曾利用九大后政局的短暂平稳时期，大力恢复因文革运动造成的生产停滞，使国民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周在四届人大上提出要在二十世纪末将中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这一符合民心的宏伟蓝图，使得周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关头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方。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周去世后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怀念和敬仰。

林彪在文革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有以下几点：

（1）在文革混乱的局面中保持了军队的稳定。林彪极为重视军队的稳定状态，不许地方武斗夺权之事在军内发生，“军委八条命令”就是最好的一例。而军队的相对稳定使后来的“三支两军”能够顺利进行，对保证地方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2）林彪严防江青一伙染指军队事务，诸如搞掉“全军文革小组”使江青无法插手军队

事务。即使后来林彪倒台，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也无法迅速有效地填补军中出现的空白，更无法找到自己在军中的代理人，这实际上为日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文革期间，即使地方再乱，生产停滞，但林彪领导下的军委办事组从未放松国防安全和建设，文革前国防和“三线建设”在文革中是延续的，没有中断，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开发有了快速的发展。不仅巩固了国防，还顶住了前苏联的试探性进攻。

（4）林彪存在的本身就是对江青“上海帮”的遏制，换句话说，就是要对江青等人的行为有所约束，包括林让黄永胜、吴法宪向毛反映江青对周恩来的恶意攻击等。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打击张春桥更是明显的一例，只是庐山会议的斗争触及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才招致林的失败。庐山会议前，江青等人虽有毛泽东的扶植，但毕竟还只是文革中的暴发户，在中央高层相对处于劣势，其政坛势力与军方相比还相去甚远。但林彪倒台后，“四人帮”在党内的势力大增，在中央高层也占了优势，中共十大上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春桥不仅荣升政治局常委，还当上了解放军总政主任，“四人帮”开始染指军权。这在林彪在世时是不可能发生的。

周恩来与林彪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周恩来更能忍隐，更会小心处理好与毛泽东、江青的关系，对于来自毛泽东和江青的批评、指责甚至谩骂不会公开说“不”，周时时处处检讨自己以往的过错，向毛江输诚表忠，甘于作毛江的工具。王力回忆说“至于对周恩来在历史上的路线错误，周恩来自己从来不回避，从来是到处讲，讲得别人都不爱听了。毛泽东也不避讳，当着周恩来的面，不但对中国人，也对外国人公开讲。”（93）与周恩来相比，林彪则更有自己的主见，且林彪从来不作自我作践式的检讨，特别是“913事件”前夕，林彪面对毛泽东的淫威和打压，敢于对毛硬顶，敢于对毛泽东说“不”，其不甘于作毛泽东的工具显示出林彪独有的性格。无论林彪最后是主动出走还是被动出走，事实上林都是被毛泽东逼走的。林彪虽然身死大漠，但其对毛泽东的一击却起到了唤醒国人的作用，使毛泽东的神话彻底破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败亡。华飞先生说得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清醒就是从林彪的死开始。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和副统帅身份与‘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决裂并在此之后非正常死亡是他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94）

周恩来与林彪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哲学对当今社会亦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皇权统治下，人民大众对正统当权者的倒行逆施习以为常，且逆来顺受，如非走投无路绝不会铤而走险，这种惯于作“奴才”的成王败寇心态潜移默化，深入到人们的骨髓之中。所以，不少人将林彪敢于对毛说“不”与毛决裂视为大逆不道，而对周恩来的忠心侍主、委屈求全和鞠躬尽瘁津津乐道。时至今日，我们也应有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周林二人文革中的所作所为。

林彪在文革中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1）中共自七大起就将毛泽东定位于一尊，具有最高的权力，只是个人崇拜在战争年代还不那么显著突出。中共建国后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都曾大力制造了对毛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1959年9月9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表态说：“我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95）邓小平直接负责的与“苏修”论战的“九评”中，更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频频肯定个人迷信，将个人迷信上升到理论高度，成为中共中央的集体表态。周恩来导演的大型音乐舞蹈诗史《东方红》，更是大吹特吹毛泽东，此后又将其拍成电

影全国放映，其影响至深且巨。在这个整体环境下，林彪也参与其中，大力鼓吹“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等等。与此同时，林彪大搞“突出政治”运动，诸如在军队创造出“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第一”以及“学毛著”，“学老三篇”等等。中共全党这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运动深入到各行各业，渗透进千家万户，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效果之强使得中国大地的精神面貌为之改变，使毛泽东成为凌驾于全党全国的最高“神祇”，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重要筹码和依据。

（2）文革前夕和初期，毛泽东为了将林彪拉上文革的战车，1966年3月毛和江青一手操纵出笼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5月7日毛给林的《五七指示》以及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公开赞扬“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开展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些都是毛泽东主动树立并利用林彪在军队中的威信，实际上是毛为文革大业所作的必要准备。而林彪也大树毛泽东的威信，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林彪称颂毛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等。毛泽东还发出号召“全国学解放军”。毛林这种“互树权威”“互树威信”的做法，使毛林二人的声望和地位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时期空前高涨和巩固，而毛泽东对周恩来，周恩来对毛泽东却没有形成这样的关系，因此，林彪在树立毛泽东的威信和个人崇拜方面比周恩来走得更远。因此，林彪在这一点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文革前期，林彪支持了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运动。文革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浩劫，其中的代价极为惨重其教训亦极为深刻，特别是运动中相当一批干部和普罗大众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甚至死于非命。虽然毛泽东是文革的始作俑者和决策人，但其中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林彪，在当时的体制和政治环境下，林彪不可能事事置身事外，一点责任没有，诸如罗瑞卿事件、贺龙事件和“杨余傅事件”等。林彪当然要负他的那份责任。然而由于大陆官方刻意掩盖那些不利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资料，将一切罪责归结于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乃至许多历史事实被歪曲被篡改，全面厘清这段历史还需更多的材料和知情人士的披露。所以，我们在研究文革这段历史时，要尽力追求事实真相，澄清史实，这样才能分清历史责任，而不是根据政治需要将所有责任推到某个人的头上。换句话说，既不要搞“为尊者讳”，也不要搞“妖魔化”。

结 论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针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说过一番话：“‘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了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然而，邓小平在谈及林彪时却将林彪归结为“反革命集团”，声称“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96）

通过上文对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周恩来在文革当中绝不是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说了违心的话”和“做了违心的事”这么简单，林彪更不是“成立了反革命集团”要“阴谋夺权”。周恩来与林彪都是毛泽东发起和推动文革的重要力量，周林二人又是步步紧跟毛泽东的各项“战略部署”的，而周恩来更是一心一意地积极参与和支持了文革的深入进行，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工具之一。认真比较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出周氏在文革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保障了文革得以顺利进行，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的任劳任怨和兢兢业业，周恩来成为毛泽东文革运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邓小平后来对毛泽东文革运

动的否定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周恩来所作所为的否定。但是邓小平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心将周恩来送上新的“圣坛”，将林彪打进“十八层地狱”，罔顾事实地将周恩来与林彪和“四人帮”区分开来，力图证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言行都是“违心的”，邓小平此举不仅不能“洗清”周恩来文革中的责任，反而使周恩来得形象堕落成一个没有人格的软骨头和伪君子，这同样也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和篡改。

邓小平这种人为的二分法，以两种不同的标准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与功过，将毛泽东、周恩来与林彪分成所谓“好人犯错”和“坏人犯罪”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毛泽东的祸国殃民作开脱。假使邓小平这段解释周恩来的话能说得通的话，那么它用在林彪身上也同样合适。林彪在文革中不也说了些违心的话，做了些违心的事吗？且林彪说的违心话比周恩来要少得多，违心事做的更比周恩来少得多。凭什么林彪就是“成立了反革命集团，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而周恩来就是“忍辱负重，鞠躬尽瘁”呢？更何况林彪最后敢于挺身而出打击毛泽东赖以发动文革的“功臣”——张春桥，林彪以自己的行动显示出自己对文革的实际态度，可周恩来却只有相忍为“党”（实是为毛），俯首贴耳，逆来顺受。所以，林彪的倒台与文革中其他老干部的倒台是一样的，林彪事实上从毛泽东文革运动的助力变为阻力而被毛泽东所不容所打倒。仰天长啸先生分析得好：“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段惨痛的历史证明，只要毛泽东坚持文革中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是林彪最终要与毛决裂，所有有正气的老干部最终都会与毛分道扬镳的。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以他老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一网打尽，就是有力的证明。”〔97〕华国锋、叶剑英等粉碎“四人帮”实乃完成了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未竟之业。

然而，正是由于邓小平在1980年的这番似是而非的谈话将周恩来文革作用定性为“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而将林彪定位于“反革命集团”，一年后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照搬了邓的这一讲话精神，将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定位于“对立”与“斗争”，以后国内的党史研究者只能在这个圈子里打转，难得突破难得进展。事实上，邓小平的这番讲话不过就是一个新版的“两个凡是”，它不仅不是冲破了文革史研究的禁区为文革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航道，反而是为文革史的研究设置了新的禁区和障碍，成为日后官方研究周恩来的定版模式，周恩来的形象也被脸谱化，变成“文革正确路线”的代表，成为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坚决斗争的“中流砥柱”，这无疑与历史的真实相差太远。所以我们对周恩来与林彪的研究必须彻底抛弃《决议》给周林二人的脸谱型定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客观地梳理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当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这才是海内外史学研究者应该共同秉持的原则和立场。

注释：

〔1〕金春明、崔久恒《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思想与活动研究述评》，载《周恩来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544页

〔2〕《王力反思录》下卷，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577—578页

〔3〕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海南出版公司，1999年1月版，190页

〔4〕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195页

〔5〕《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1967年12月5日），参见余汝信《周恩来的“政变经”》，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第472期 2004年10月15日

〔6〕余汝信《周恩来的“政变经”》《枫华园》第472期 2004年10月15日

〔7〕《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版 628—629页

〔8〕《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 629页

〔9〕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1967年1月27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02年出版

- (10) 余汝信《林彪“5·18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第436期 2004年2月6日
- (11)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版 114—115页
- (12) 何蜀《对林彪几次天安门讲话的一点考证》 参见丁凯文编《重审林彪罪案》下卷 明镜出版社 2004年7月版 610—613页
-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1月版 107页
- (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106页
- (15) 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6年9月25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02年出版
- (16) 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5月版 1—7页
- (17) 《王力反思录》 下卷 647页
- (18) 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1966年8月5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02年出版
- (19) 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8月27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02年出版
- (20) 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8月31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02年出版
- (21) 舒云《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幕》，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470期 2005年12月7日
- (22) 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14页
- (23) 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 1967年1月14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02年出版
- (24) 周恩来在大专院校及各机关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年1月17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02年出版
- (25) 《王力反思录》 下卷 808页
- (26) 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年12月版 3页
- (27) 穆欣《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次斗争》 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 15—30页
- (28) 温相《林彪对江青的集中吹捧揭密》 见互联网《文学城》的温相博客 <http://blog.wenxuecity.com/archives.php?date=200406&blogID=12>
- (29) 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 27页
- (30) 《王力反思录》 下卷 984页
- (31)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234页
- (32)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版 490页
- (33) 《王力反思录》 下卷 711页
- (34) 周恩来江青在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8年3月24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02年出版
- (35) 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36) 张云生、张丛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版 277—278页

- (37) 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上卷 华文出版社2002年6月版 150—151页
- (38) 《吴法宪回忆录》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第654页
- (39) 《吴法宪回忆录》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第656—657页
- (40) 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见《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453、454期 2005年9月5—6日
- (4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197页
- (42) 周恩来传达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1月27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43) 周恩来就民航系统军管一事给吴法宪的指示 1967年1月25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44) 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的指示 1967年2月17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45)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 648页
- (46) 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3月13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47)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 651页,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48)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 653页
- (49)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50)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 657—658页
- (51)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52) 《王力反思录》 下卷 711页
- (53) 傅崇碧《大树参天护英华》, 见《周恩来的最后岁月》 安建设编 60页
- (54) 李海文《周恩来研究述评》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年3月版 551页
- (55) 《王力反思录》 下卷 726页
- (56)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184页
- (57)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58)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59) 纪希晨《陆定一谈文革经历》 见《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
- (60)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61)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62) 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27页
- (63)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64)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65)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66)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191页
- (67) 张云生、张丛坤《“文革”期间, 我给林彪当秘书》 79—80页
- (68) 张光渝《拜访王秉璋叔叔》, 载《老照片》第四十四辑,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 (69) 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见《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453、454期 2005年9月5—6日
- (70)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245—252页
- (7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 见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1月版 381—382页
- (72) 余汝信《在雷英夫未被追究的背后》 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444期 2

- 005年7月6日
- (73)《王力反思录》 下卷 923页
- (74)叶剑英对文革中周恩来的评价,见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3页
- (75)《王力反思录》 下卷 724页
- (76)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77)见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第一辑,1967年3月,181页
- (78)原文载《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年5月7日
- (79)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02年出版
- (80)《杨成武将军自述》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7年8月版 303—305页
- (81)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516页
- (82)《王力反思录》 下卷 725页
- (83)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84)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第298页
- (85)《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 684—712页
- (86)林彪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4.14)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87)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278页
- (88)《周恩来年谱》 下卷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年5月版 367页
- (89)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见《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453、454期 2005年9月5—6日
- (90)《吴法宪手稿》,转引自金秋《权力的文化——文化革命中的林彪事件》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119页 (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ge 199)
- (91)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见《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453、454期 2005年9月5—6日
- (9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298—299页
- (93)《王力反思录》 下卷 1108页
- (94)华飞《“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 华夏文摘增刊 第314期,2002年11月18日
- (95)《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103页。
- (9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94年10月第二版 346—348页
- (97)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见《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453、454期 2005年9月5—6日

□ 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2007年3月版 田园书屋出版

~~~~~

## 【书 评】

记忆的备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评述

• 寒 山 •

简介：2007年3月，由著名文革研究者宋永毅先生主编，香港田园出版社把与会者的论文加上其他一些重要讨论文章和文献汇集成册，分上下两集出版，书名为《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完成了一本一百万字、1000多页的厚重作品。……那么，这部一百多万字的文集是如何成为文革记忆的一个备份的呢？请看我们的分别介绍。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或者甚至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公共生活中，一个恶梦一般的情景就是一朝醒来，发现电脑中储存的全部数据不翼而飞。这种电脑数据的丢失只有三种原因：无意的操作失误，电脑故障和遭受病毒的侵害。防止电脑数据丢失的最安全办法是为电脑中的数据储存一个甚至多个备份。

那么，和电脑失据相比，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更是可悲的，因为这意味着生命的不完整。一个失去记忆的人也是可怕的，因为这意味着以往生命中用吃亏甚至苦难和惩罚换取的教训也随风而去。不言而喻，如果一个社会的历史记忆象一个个体的生活记忆那样丢失，这个社会以往的牺牲就化为乌有，它的未来就难免让人担心。

文化大革命就是当今中国的一段在官方压制下强行被淡忘、被强行从公共讨论中缺席的历史。文革至今已40多年，很多当事人已不在人世。为了给这样一段民族灾难的历史记忆留下一个备份，哪怕只反映十年浩劫的一些侧面，一些文革的研究者去年在纽约参加了纪念文革四十周年的集会。

2007年3月，由著名文革研究者宋永毅先生主编，香港田园出版社把与会者的论文加上其他一些重要讨论文章和文献汇集成册，分上下两集出版，书名为《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完成了一本一百万字、1000多页的厚重作品。这样一部纪念文革、探讨文革的重要作品的问世，理应受到中文世界的重视。对于不准许自由讨论文革的大陆读者而言，哪怕见不到读到这本书，能从广播和其他途径中知道它的存在、了解一些内容，也是一种安慰。

十年前，也就是文革三十周年时，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合作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由杨建利主编的五十多万字的论文集《红色革命和黑色造反》，对推动文革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去年五月在纽约召开的纪念文革四十周年的讨论会是对那次纪念活动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文革结束以来最大的学术讨论，海内外几十个研究文革的学者和作家济济一堂，畅谈并交流对文革的看法。尽管很多大陆的研究者受到官方阻挠无法出席，但他们的论文还是递交给了讨论会。会议受到了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北美世界日报、星岛日报、多维时报和其他一些报刊电台的广泛报导。中共对文革讨论的压制如此不得人心，使得一些出于政治压力和经济利益而在政治上持所谓中间立场的媒体也看不过去，例如香港明报就指责中共的做法“不利于全民反思文革”。美国著名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林培瑞在序言中就书名发表了精彩的评论。他说：“‘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这两个概念都很重要，各有各的价值，但关键在那个小小的‘和’字。”因为只有记忆的是历史真相而不是政治神话时，这样的记忆才会有积极意义；然而这还不够，只有当对于真相的记忆扎根在集体中而不是被少数人谈论时，这样的集体意识才会对民族的健康发展产生作用。那么，这部一百多万字的文集是如何成为文革记忆的一个备份的呢？我们下次再介绍。

为了让国内的读者了解这些文章所涉及的范围和讨论的问题，我们现在分别介绍上下册的一些主要内容。

上册有七个专题。第一是“文革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方法”。大陆学者徐友渔回顾了中外学术界对文革的研究，指出虽然文革发生在中国，但到现在为止，文革研究的主要成果都是在国

外发表的。他认为中国学者担负著文革研究的主要任务，但他们需要向西方学者借鉴社会科学的方法，用理论框架来规范研究，扩大视野，超越自己的直接经验。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周原对文革研究的史料和史料学的各个方面作了概述，强调了抢救文革史料的紧迫性。大陆学者邢小群介绍了口述史在文革研究中的重要性，考虑到文革时的中年人现在已步入老年，她认为在没有条件正式出版文革史料的情况下，录取口述史料是目前抢救文革史料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二个专题是“文革与世界”。在美国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对比了苏联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指出虽然两者有相通和继承之处，但苏联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把摧毁传统文化和完全抵制西方文化作为目标，因此苏联多少保留人类文明的很多元素，而中国的文革完全是对文化的毁灭。美国学者程映虹介绍了文革对亚非拉的冲击，指出文革和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根源都在于对现代文明的反动。美国学者郭建分析了西方左派和各种“后学”对文革的辩护甚至赞美，指出这些貌似高深的理论或者是对文革真相的无知，或者就是故意对真相避而不谈。在中国正大行其道的左派对文革的赞美其实不过是拾西方学者的牙慧。

第三个专题是“文革的政治文化渊源”。大陆学者谭天荣在他经过修改的写于1968年的文章中指出了文革和毛泽东自1949年以来一贯的左倾政策之间的联系。年逾八旬的朱正先生是大陆著名的反右历史学家，他指出了反右和文革之间的历史联系，指出前者其实是一场流产的文革。大陆学者王年一的文章也指出了文革和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之间的继承关系。

第四个专题是“毛泽东与文革”。美国学者华新民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研究作了述评，认为一些左派仅仅从毛泽东本人的言论出发来判断毛的动机，例如反官僚，为下层群众提供政治参与的机会等等是对文革本质不着边际的解释。已故大陆学者王若水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的很多所谓理论和口号都是出于党内政治和权力斗争的需要，因此并不是先有理论再有斗争，而是相反，为了打倒党内对手而发明理论和口号。大陆学者王力雄指出了文革是毛泽东为了满足个人乌托邦狂想、要在人间建立理想天堂的极端尝试，为此不惜让国家和民族作出惨重牺牲。旅美作家李（吉力）指出文革是毛泽东个人天下与党天下长期矛盾的结果，是前现代专制社会中君臣矛盾在现代条件下的重演。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学者对被中共官方所粉饰的文革中的所谓正面人物提出了新的看法。美国学者宋永毅对刘少奇在发动文革中的责任作了分析，指出刘少奇固然是文革的牺牲者，但他也是文革中很多政策和做法的始作俑者，例如众所周知的“坐喷气式”的斗人方式在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指导四清运动时就采用了。美国学者丁抒对叶剑英在文革中的重要作用作了分析，认为叶剑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安排在军内的自己人，叶剑英后来的地位正是在文革中确立的。美国学者丁凯文对比了林彪和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认为他们都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最主要的助手，周的作用实际上更大。周也不是官方所说的那样一直和林作斗争，而是相反，他们彼此合作，在毛泽东号令下推动文革。

上册还有一个重要专题，介绍在文革中一代人的思想演变。美国学者宋永毅重点介绍了文革中的地下读书运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共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出版一些专供高干阅读和批判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和国际共运中批判斯大林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文革青年中得到流传，反而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有些地下读书运动的参与者还就此走上了政治异议的道路，其中最突出的是上海的王申酉。1977年，在四人帮下台之后，他竟然还在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下被判处死刑。今天在大陆和海外的很多经过文革的著名学者和作家当时都或多或少受到这场地下读书运动的影响。美国学者杨国斌通过从红卫兵到下乡知青再到1976年天安门民主墙这十年间中国青年身份认同的转变剖析了中国青年在文革前后的社会政治作用。

《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的下册有了四个专题。第一是“新史实和新思考”，涉及的问题包括1968年武汉7.20事件，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迫害人民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1976年天安门事件。第二个专题是暴力、宗教和少数民族。美国学者苏杨对湖北、广东和广西在文革中发生的集体大屠杀作了非常详尽的实证研究，指出人们通常之注意对知识分子、干部的暴力行为，忽视了针对毫无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大量平民的屠戮。苏杨的研究主要依据的还是官方出版或者编辑的县志，在中国当时2250个县中，他集中阅读了235个县的材料，得出结论说当时全国每个县受迫害死亡的平均起码有80人，在两广地区高达300多人。这种普遍的暴力和屠杀，离开了国家政权的鼓励和纵容是不可思议的。西藏作家唯色和澳门学者陈惕洁的文章对文革中西藏和内蒙这两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暴力和政治迫害作了揭露。

第三个专题是“文艺、文化和革命”。大陆学者崔卫平考查了电影中表现的文革；美国作家和诗人梅振才收集和介绍了反映在私下流传的诗词中的文革；大陆学者谢泳研究了文革时期最出名的文学刊物《朝霞》是怎样用艺术为文革意识形态服务以及知识分子的命运。最后一个专题是集体记忆和文革博物馆。美国学者徐贲对国内兴起的所谓“文革怀旧热”这样评论道：“记忆人间的苦难、人性灾难和暴政邪恶是一件痛苦而庄严肃穆的事。当人们把文革记忆看得和旧家具、旧笔筒一样轻松的时候，他们的道德神经已经麻木了。”他指出国内目前商业性的“文革热”正用市场的力量帮助官方完成了对文革记忆的“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对文革灾难的历史记忆正在被文物市场和消费娱乐所淹没。

文革发生于中国，但受到世界性的关注，研究文革的西方学者也用流利的汉语贡献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法国汉学家潘明啸（MICHEL BONNIN）对上山下乡运动作了再考查，指出这是一场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改造一代人的社会实验，也是个表面上凭“自愿”申请的大规模集体流放，在思想、精神、心理、技能和就业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失落的一代”。美国学者司马黛兰（DEBORAH SOMMER）精心收集了大量70年代批林批孔时期问世的漫画、宣传画和连环画，用生动的形像重现了文革毁灭中国文化的黑暗一页。

由于篇幅的限制，对这套文革纪念论文集只能作如上简单介绍。让我们衷心希望下一套研究文革的论文集能够在大陆问世。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